

## 情理之間、常變之交、天人之際

廖咸浩\*



研究必須有切身性 (relevance)，不論是與個人的處境或社會福祉相關的切身性。用傳統的詞彙來說切身性就是「情」。惟其有情，研究才能持久與深入；否則若只是趕時髦、求虛榮或耽於心智遊戲，都只能有一時的動力。然而，文學研究者（或者人文學科的研究者）本身較為易感，故情是研究最重要的動力，也常是研究的阻力。情讓人義無反顧，但也常使人為情所惑。如何兩者間不偏不倚，也是研究者必有的修為。

當然，隨時超越過去的自己是另一個重要的面向。學術本身雖然一板一眼，但驚喜（尤其是與更寬廣的世界神交的驚喜）則是讓學術具有靈魂的關鍵。在恆常是「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的學術孤獨中，惟有一抬頭乍見「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才能為研究帶來真正的滿足。

\*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從博士論文開始，切身性或情一直是我能不畏獨行、踏實耕耘的主要原因。

我的博士論文做的是比較詩學。會研究詩學除了因為在大學時代喜歡寫詩之外，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大學時期曾經因為詩而與其他學院的學生辯論。當時的辯論所觸及的其實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也就是文學有什麼社會意義的問題。這是一個永恆的問題，每一個時代總有人要問這個問題，而每一個時代的詩人也都必須回答這個問題。因此，我一開始對文學的興趣，就不是一種細瑣或純感性的興趣，而是對文學本質的叩問。所以我對於詩學的研究是出於自身的纏念，同時也無可避免的與本體論及社會意義緊密相關。換言之，我關心的是，在詩出現的當下，是否有異於日常的經驗，而可讓人經由詩，對世俗的世界予以重估與再審。

回到臺灣任教之時適逢解嚴，出於對臺灣未來的關心，又因甫習得了各種門派的西方當代理論，使我的研究有部分轉向臺灣文學與文化，期望能透過這方面的研究為臺灣的未來找到最美好的路徑。但在這個過程中，卻也漸漸理解到「情」對學術的干擾，尤其是當代研究因研究者過度用情而極易政治化。而另一方面，也從中更進一步體會到人文學科，乃至所有學術與意識型態的糾葛。不過最終而言，反而讓我更能一窺人文學科的深沉、複雜及趣味。有時雖不免會因此而覺得神傷，但因人文學科牽涉到人與人以及人與社會的關係，故探索其變的重要性，有時甚或超過探索其常。或說人文學科本來就是在常中窺變、在變中求常。

我對《紅樓夢》的研究即是從變與常的辯證中展開的。透過生產條件的重建與文本細讀，來重詮這本被老舊的研究方法扭曲為個人感情史或家族興衰史的書，固然是欲究其常，但書中情懷若置諸今日的語境，究竟會產生何種不同的反思，則是欲探其變。但這其中最大的動力，還是來自於切身的問題。寫第一篇論文時，我剛好面臨了類似於賈寶玉的存在掙扎。故研究《紅樓夢》最初也是為處理自身的困境。

這個體悟在我開始接觸德勒茲及受其影響的新物質主義後，變得更具層次。對德勒茲的入門起因於與氣功的接觸，並由此而貫通了此一思潮與傳統道家的思維。德勒茲一反西方傳統，從「變化」的角度出發，以「能量」闡釋本體，很接近於道家哲學對「化」與「氣」的重視。其後的新物質主義也都是從這個基礎的認知出發，雖各有偏好與專擅，但共同為新的學術典範提供了沃土。

這也使我更具體了解到傳統文化的豐富深廣及其所蘊藏的當代意義。在後殖民理論的啟發之後，研究西學已不再是亦步亦趨的一味以西方為師，而必須根植於在地的土壤，因為西學已屬於全球而非西方禁燬，而在地正是全球性的

體現與落實。故研究德勒茲（或任何西學）就必須以互補研究（complementary study）的方式將中西傳統互相燭照、彼此激發，甚至開發出更超前於新物質主義的思維。

然而，情能載舟亦能覆舟。情除了常讓人不辨是非之外，也常讓人見樹不見林；研究的深入常讓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故到了一個階段，廣博才是讓人打開視野的關鍵。比如，我自小喜歡閱讀與少數民族及海外華人相關的著述，但從未想到這些知識與我的研究會有相干。但自後殖民理論問世以來，這類知識卻成了我在這個領域能制得先機的重要條件。而近年我開始進行華人海洋文化的研究更得力於這些自早年一直累積的知識與思考。另外，在十多年前意外到官場走了一遭，更讓我深刻體會到理論與實踐之間微妙的關係，並讓我在此後的研究中增加了政策面的思考，研究自此不再是徒有理念的冥想，而皆有落實的準備。

我目前持續在進行的四個研究方向，便是基於上述的原則及洞察。

首先是 *Deleuze and Taoist Thinking* 《德勒茲與道家思想》一書的寫作計畫。這部分的研究已經進入整理成書的階段。本書以「互補研究」(complementary study) 的方式對道家及德勒茲思想中似同又異的觀念（如 human, nature, love, vitalism, time, nomadism, body, nourishment）進行全面的探討。這種研究具有雙重的意義：一方面能以當代語彙進一步解讀一般認為神祕甚至過時的傳統中國哲學，以重建其當代相關性；另一方面可憑藉中國傳統哲學為靈感，繼續探索西方思想尚未深入的領域。

其次是 *The Sino-Maritime: The Chinese Diaspora and Alternative Modernity* 《華人海洋文化：華人離散與另類現代性》一書的寫作計畫。本計畫也已進入整理及成書階段。本書將以〈華人海洋〉一文為基礎，融入過去本人對「南方」及「海洋」等相關文化議題的研究成果。本書透過對華人海洋文化的重新考掘，顯影華人傳統海洋文化在三重壓力下所形成的另類現代性，以及其所蘊含的「後中國」動能在當代所具有的進步意義。

其三是以《本體美學：物質主義比較詩學》為題的比較詩學的研究。本計畫主要將從德勒茲「本體美學」(onto-aesthetics) 出發，重新探討本體 (ontology) 與詩學被棄置已久的關係。從「詩是否只有文字本身」的問題出發？叩問「詩感」(poeticity) 與本體的關係。故本計畫即是以此本體與詩的關係為核心，對比較詩學進行脫胎換骨的工作。

最後則是以《不自然的自然：新物質主義與生態評論》為題的生態評論 (ecocriticism) 研究計畫。這個研究也歸因於德勒茲及新物質主義對「物質能動

性」(material agency)的革命性思考。輔以對「人類世」(anthropocene)急迫性的體認，本計畫從重審「自然」的概念開始，對生態評論進行重整，以追求真正貼近當代生態困境的新論述與新策略。

其次我想談談做研究的技術層面。研究最困難的地方是找題目，而題目選得好（特別是具有兼及全球及在地的原創性）則是研究成功的一半。廣泛而有主題的閱讀與累積固然能提供題目萌芽的沃土，但理論視角的有或無、新或舊往往有決定性。沒有理論視角就沒有研究方向；有扎實的理論配備，幾可謂題目俯拾皆是。反之，若無理論，或即使有但過於陳舊，都不可能有新的發現。不過，耽溺於玩弄理論而沒有在地現實的體認，又易落入我先前提到的心智遊戲之中，或只是對理論先進學術圈的效尤，最後落得所關注的議題只是別人的議題，或以別人的策略來處理在地的議題。故對生命嚴肅看待，並時時詰問現實、回顧傳統，才能在切身問題中找到對個人及社會具相干性而又能介入國際學術圈的議題。

但如何從題目變成一個具體可行的研究計畫，又是一個關卡。其實，就人文學科而言，撰寫研究計畫便已經是在撰寫論文本身。如是多年期計畫則可能是好幾篇論文的雛形。因此，對題目本身沒有足夠認識、累積與思考，很難寫出一個有深度也具條理的計畫。最理想的狀況當然是，自己已經有一二相關領域的論文產出，作為新計畫的前導研究。

由閱讀中尋找題目是一個階段，以更多的閱讀來落實這個題目是另一個階段。但前一階段何時結束、後一階段何時開始並不會有明確界線。從找題目到寫研究計畫可以說是一個漸層的過程，重要的是這個滾動式的過程能持續不斷的演進。在這個過程中必然會經歷不斷的修改與調整，而這才是想法能化為可行之計畫的關鍵。

題目最初只是一個 hypothesis（假設），甚至只是得之於瞬間的 hunch（直覺），行得通與否端視直覺來到之前的訓練與累積，更有賴之後的資料蒐集與整理。這個過程就是對假設或直覺的檢測。因此，在年輕一點的時候，常需要大幅調整甚至放棄初衷的勇氣，因為畢竟累積仍有所不足，直覺並不準確，最後寫出來的計畫甚至和最初的構想大異其趣也不奇怪。所以人文學科的研究能力與累積有密切的關係。但先前已提到過，累積並不足為俟，方法也必須與時並進，而這方面則年輕學者未必沒有優勢。

計畫寫作有如論文，必須始於文獻回顧，以界定自己的題目與學界現有研究成果的關係，並凸顯計畫未來可能的貢獻（也就是原創性）。其次當然是展示在這個題目上已有的思考與累積，尤其要顯示出自己的研究方向條理分明且具

體可行。但既然是計畫，當然仍有待發展，故自己若能清楚了解計畫本身猶待開展的部分及潛在的困難，更能讓人覺得這是一份可以落實的計畫。

以上心路歷程與研究策略的分享或多為老生常談，但如能有一二火花於扉頁前冒出，則不枉本文。